

□成茂

打开跨学科研究之门

神话与传说的产生,并不是靠纯粹的想象。神话与传说的传播,也必然不反映那时人们的美学观念与艺术情趣。神话与传说与其说是一种创造,不如说是基于经验的直观摹写或者说是直接叙述。

20世纪初,西方神话学传入中国,大大促进了中国神话研究的发展。其中最重要的事件是闻一多《神话与诗》的问世。这是一部由21篇文章组成的论文集。在其中《伏羲考》一文中,闻一多结合流传在西南各民族中的兄妹婚故事,以及汉代以来石刻和绢画中的图像,描写了一部以伏羲、女娲为名义的文化史,即从古老的蛇图腾发源,经由半人半兽神、人格神等阶段的思想史。此外,他还进行了一系列神话学和民俗学的比较研究。例如,结合神话学和民族学资料,讨论了端午风俗的来源;利用关于古代风俗与祀典的记载,考释了姜嫄弃子、高唐神女等神话。

对于以文献学为基础的中国传统学术来说,这种研究具有划时代意义。它把神话研究提升到对神话时代的人类生活进行还原的新境界。考古学、民族学、语言学,从此成为中国神话研究的必要手段。

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,尹荣方就陆续发表有关中国神话的文章,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。《中国神话求原》初名《神话求原》,2003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,该书严格来说是一部论文集,所收篇目大多发表于二三十年前。由于对中国上古不少神话传说的起源作出了一些原创性的解释,这本书的影响力颇大。

比如,在《夸父逐日的意蕴》一文中,它把汉民族的夸父神话同拉祜族的扎鲁树神话以及彝族、纳西族、哈尼族的历法树神话相比较,通过几组细节上的对应,判断夸父逐日神话是对中原民族先民原始测日活动的记录。这样一来,夸父神话便被安置在一个内容丰满的文化背景之上,得到了合乎逻辑的解释。

再如,尹荣方认为上古神话、传说中所涉及的神奇飞禽走兽,不全是抽象概念与观念,应与先民的生产、生活实践密切相关。他遵循“有用”的原则,认为凤凰与麒麟原型分别是大雁与麋鹿。普通的大雁与麋鹿之所以会被神化,是因为农业社会最重历法,而大雁、麋鹿恰恰具有“指时”的特性,这是它们异乎寻常的有用性。尹荣方强调神话、传说是先民直观经验的总结,这给后来的神话学研究带来诸多启示。

当然,书中并非所有的篇章都被读者认可,有些论点也受到读者不甚客气的批评,如关于《山海经》中赫赫有名的西王母的原型为织布机、龙的原型是树神等观点,就有人认为太过牵强。

结合一些新材料,尹荣方在新版书中做了解释性回应。他认为当初西王母织布机之说,“客观上为后来的织女星说作了铺垫,而书中关于西王母织布机论说的文字,则未必没有意义”。至于龙的原型是树神,后来他了解到三星堆遗址发现青铜树神缠有神龙时,就更加相信龙与树之间存在



为中国神话找寻现实原型

女娲补天补的是历法,夸父逐日逐的是时间,《山海经》里九尾狐是天上的星宿……《中国神话求原》是神话学者尹荣方的代表作,该书曾一度绝版,近日由读客文化再版。《中国神话求原》探究了30多个中国神话故事,通过严谨的考据和缜密的分析,为我们展现了中国神话背后的现实原型,并指出中国神话其实是古人的科学探索,蕴含着丰富的古人智慧,体现了这一学科的独特魅力。

着紧密的联系,认为“假说的提出也自有其合理的成分”。

尹荣方也承认,当年书中一些观点现在看来未必正确,需要重新认识。其实,他后来发表的一些相关论文,对书中的说法陆续有所修正。如关于“应龙”为泥鳅之说,尹荣方最初认为禹治水关乎上古之“沟洫制”,泥鳅自然应是沟洫中常见之物。随着研究深入,尹荣方现在更倾向于认为应龙是喻指心宿、尾宿这些关乎龙的星座。

大禹治水的别样解读

中国上古神话传说与上古历史交织在一起,难解难分,学术界向来有“神话历史化”与“历史神话化”的不同说法。尹荣方的总体思路,是认为上古一些圣王的历史记载,可能未必真有其人其事,从这个角度看,他属于“神话历史化”一派。

上古帝王圣人的所谓历史,很多是后人托言而成。战国以来,托言可谓蔚然成风,《墨子》《庄子》《列子》《荀子》《韩非子》《楚辞》《吕氏春秋》《淮南子》等都有此倾向。如《尚书》明明白白记载了尧、舜、禹的禅让历史,《韩非子》却说“舜偃(逼)尧,禹偃舜,汤放桀”,完全予以否认。在尹荣方看来,韩非是想托舜、禹“篡位”之说,来论证君主治国驭臣当重视“法”“术”“势”等权谋,其目的是为法家理论服务。

因此,尹荣方虽然相信神话常常构成历史,但同时认为,中国上古神话历史化的过程,绝非毫无来由的随意虚构,往往由“语言的疾病”讹成,或是由对传说对象的想象而成。从这个角度看,神话中也确实含有历史,这是神话具有极其重要价值的原因之一。换言之,上古的不少神话传说,本就是由真实历史造就。比如堪称中国神话核心的大禹治水,尹荣方认为它

尚关乎上古人民“规天划地”的伟大业绩,具有创世的意味。

此前,神话学者吴晓东发现《山海经》“大荒之中”的“山”恰好是二十八座,便将它们与天上二十八星宿对应。尹荣方注意到,《禹贡》叙述禹“导山”也恰好是二十八座,且这二十八座“山”,从前的星家明白无误地将它们与天上二十八星宿一一对应。同时,禹导山的顺序与天上银河起没于二十八星宿的行径完全一致。受此启发,尹荣方作出推断:上古星家在构筑天地结构、制定历法时,是以银河作为坐标体系的。

尹荣方认为,尧、舜、禹时代的“大洪水”是一种隐喻,即混沌时代的隐喻;大洪水得到治理,意味着混沌被克服,时间、空间的次序得以建立。古人克服混沌,天上的银河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,这就是大禹治水神话产生的现实基础。

进而他提出,上古圣王通过观测天上的日月星辰,包括对银河的观测,掌握季节运行的规律,制定了历法,获得了“地平天成”的效果。“这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,但它后来演绎成了尧时出现淹没大地的滔天洪水,鲧、禹父子或用神奇的‘息壤’治水,或开山浚川,或化身兽类,或得到神兽的帮助,通过十三年艰苦卓绝的治水,才最终平息了水患,等等。”

在他看来,这是史实在传承过程中发生变异,造就了包括很多神话细节的种种“治水”神话。“中国上古的神话、传说,的确是史与史实交织在一起,互为影响,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的。”

尹荣方认为,洪水创世神话曾遍布世界,表现形态看上去光怪陆离,各不相同,但仔细研究,

不难发现其内涵上的某种共性。更早的巴比伦史诗《吉尔伽美什》也充满了历法的隐喻,东方学家罗林森就曾推测,《吉尔伽美什》记载史诗的十二块泥板正与天象中的黄道十二宫对应,史诗的叙述暗含着太阳一年十二个月的行程。

看重《山海经》价值

中国上古神话、传说,似都能在《山海经》找到相应的源头,所以研究上古神话传说,不能不涉及《山海经》。

上古圣王“开天辟地”,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建设,实现了所谓的“王制”,尹荣方认为,这就是《尚书》中用虞舜、夏禹等巡守所表现的那一套完整的礼制。其中,包括测天正历、敬授民时、颁布统一的度量衡、开辟荒地(伴随狩猎活动)、教育选拔人才、封邦建国等,这些是当时重要的生产及典礼活动。

尹荣方认为,《山海经》表现的主要是“巡守礼”中测天正历的部分,而在《尚书》《诗经》等文献中,则对巡守礼作了更为具体、完整的陈述。在他看来,《尚书》《诗经》等经典,与《山海经》叙事一脉相承。“我在研究上古神话、传说的过程中,发现大量的神话、传说及相关的解释,存在于经书如《诗经》《尚书》《周易》的正文,尤其是注疏中,所以研究中国上古神话,也离不开对经学原典及其注疏的研读。”

近年来,尹荣方将研究的目光更多地投向天上,新版的《中国神话求原》在保留原貌的同时,加入一些篇章,其中,有多篇涉及古代天文学。他相信,《山海经》《逸周书》《楚辞》《淮南子》等载籍中众多的“奇禽怪兽”“神灵物怪”,不是其作者对地上实有的鸟兽虫鱼等动物图写,而是给天上星座所立之象。在他看来,《山海经》古图当是古老的星图,《山海经》所描述的山川地理,则是分野意义上的地理;《山海经》中的创辟神话,与它对星体及地上分野的认识紧密关联;而《山海经》的作者,有可能是“巫咸”之类的“传天数者”。

《山海经》在古代被视作作语“怪力乱神”者,所以两千年来《山海经》的研究者可谓寥寥。但尹荣方认为,《山海经》是今人理解上古文化的一扇窗户,通过这扇窗户,上古文化的很多迷雾尘障,如笼罩在巡守、封禅等“大礼”,禹治水等“历史”中的迷雾尘障,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驱除而有所定亮。

新版的《中国神话求原》还增加了数篇对古代一些甚有影响的民俗作溯源性研究的文章。总体说来,不仅保留了原貌,而且较初版本更为谨严;特别是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《中国神话求原》后来的某些研究成果,较之初版,内容更为充实与丰赡,它的学术性、可读性,甚至趣味性都进一步得到了提升。

今天来看,中国上古神话、传说所关乎的,既有文学、历史、文献等学科,也有诸如天文学、历法学、地理学、考古学、动植物学、姓名学、文字训诂学、氏族学、地名学,甚至陶器、玉器、青铜器等的铸造工艺学、纹饰学等,都可以交融在一起。未来,这门学科的可拓展空间依然巨大。

(作者为书评人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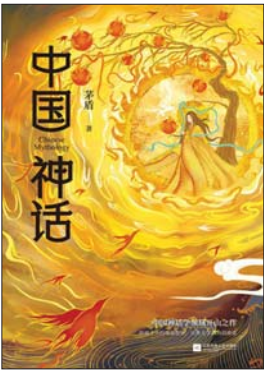
【相关阅读】



《中国神话求原》
尹荣方 著
读客文化 |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

《中国神话传说：从盘古到秦始皇》
袁珂 著
后浪 |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



《中国神话》
茅盾 著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